

引 论

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与政府引人注目的作用有着密切关系。

所谓渐进式改革，意味着改革进程受控制，控制主体必是政府。因此，研究政府的工作与研究渐进改革的逻辑有绝大的相关性。中国业已取得的经济成就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根据不同约束条件、国情，选择现代文明中自由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三大要素中“配方的剂量”，提供了一种现实的比例选择和组合方式示范。

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的第一目标是要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中国在“文革”大乱之后各种资源条件能承受的有限目标。这在逻辑上所碰到的公理（前提）性问题是，市场并非给定的制度存在，而是要建立的制度目标和结果。那种以为只要政府不干预经济并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市场机制就会立刻显灵的判断，显然包含了过高比例的一厢情愿。所有涉及变化的哲学或信仰，都不能假设时间为零。因此，假定市场已经存在的各式经济均衡模型分析，及其将政府视为多余的思维倾向，事实上只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工具理性尺度，尽管它十分必要，但在操作上却需要政府把握其时机和“剂量”，这是发达国家的“好东西在中国变味”的必然性所在。

在渐进经济改革的实践中，中国政府成功地改变了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比重，这个事实恰好满足了市场体制供给的生物进化秉性而排斥了不大真实的类似物理世界的因果关系。这意味着，即使不存在政治方面的负担，政府也具有对幼弱的市场体制的发育过程承担政治监护的责任，而这个责任又的确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四个字落到了实处。

鉴于市场具有的分散责任的性质和非人格化特征，在市场中遭遇风险或因市场幼弱而遭遇挫折和失败的人，未必会抱怨市场，但可能会抱怨其监护人——政府。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将以过快速度转化为政

治议题的时代。政府，毕竟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

中国政府在改革的旗帜下承担对幼弱市场体制生长的政治监护责任，是责任政府的应有之责，政府在改革的实战中也确有无无限承担任之嫌，不可能不忙、不累。问题是，中国是否还有成本更低的宏观改革路径选择。

循渐进改革思路观察中国，政府太累的结论是比较容易获得的：在第一层次上，中国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计划转向市场，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农业国发展到工业国，同一时空的目标繁多，手段和关键资源却相对稀缺。而在中国社会制度结构调整中可指望的现实的力量支点，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权力。因此，现代化进程往往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责任；在第二层次上，渐进改革经济体制，政府既要照料旧体制，又要培育新体制，经济职能不减反增。政府纵有管理计划体制的经验，但政府管理市场的经验却不可能比市场自身的发育速度更快。在市场制度供给不足的地方，政府享不了“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之福，更难奢望“尽可能市场，万不得已政府”的减压顺序。政府能及时转变职能就具有自我革命的性质，就不容易。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不成问题的是一定要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改变旧的资源配置方式；成大问题的是先改什么？后改什么？以及如何巧用过分集权所形成的旧体制势能，使之与政府的政治资源大体匹配。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现成地利用农民的传统期盼和经验先改农村，由农民帮政府来作改革的“动员报告”获得了成功，但这不算大成功。渐进改革中真正富于理智的大手笔在于：（1）20世纪80年代先改价格，先形成市场环境和定价机制，然后在90年代改企业，强化市场主体，使得改价格、改企业的代价——“通胀”和“失业”，分别用两个十年来到中国，政府避免了同时与两个经济“敌人”作战；（2）政府先放松对产品市场的管制，消除短缺，使市场竞争成为可能，后放松对生产要素的管制，使“购买”一套新制度的“本钱”（国有资产、国有银行）被有控制地支付。政府实质上买到了使通胀

潮和失业潮分期到达中国的时机，使改革力度能满足中国现实的约束条件。

上述两件事，铺展了一幅壮观的渐进改革画卷，离开政府与公民同舟共济的勇气和智慧，或许一件事情都做不了，恐怕也做不好。在这段新旧经济体制惊心动魄的“决斗”过程中，人们很难理性地准确评价“哪一拳必要，哪一拳不必要”。但上述改革路径也在颇大程度上形成了一旦离开政府，很多公共事务就推不动的操作惯性。这种代价是必然的、相对较小的，也是危险的。

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对于发达国家，人们看到的是诱人的结果以及由此转化来的目标理性，而政府则要权衡中国的本钱并选择发展路径，更须注重过程和手段理性。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历史遗产造就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正确方向与巨大力量长期分裂，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难以自然协调，大政府小社会是给定而不容选定的改革初始条件。问题是，当政府必须用公共权力来催化市场发育时，约等于权力在不成熟的市场中游弋，最好的结果也许就是经济迅速增长和腐败迅速蔓延的现象并存。

从世界范围看，腐败与人均 GDP 的相关度大大高于与民主政治的相关度，发达国家较之发展中国家有着程度明显的较低腐败指数。根除腐败的条件是权力撤出市场，但发展中国家催化市场发育的努力又离不开政治权力的帮助，这是一大时代矛盾，却未必是历史的矛盾。政府从基本成熟的市场中撤出，符合多数人的利益、符合市场规律，也有助政府自我减负。虽然公共政策与公职人员不是一回事，从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前提推不出政府公职人员必然为公益服务的结论，然而在逻辑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司法体制和公共管理体制均有可讲清楚的边界。中国既然有能力在短期内改革一套体制，也就预示着中国可望以较低成本与时俱进地改革其他旧体制。

中国的社会制度结构以政府权力为惟一支点的时代是风险最大的时代。市场经济体制初步成熟以后，社会制度结构的支点多了一个。伴随着这个过程，中国打破了“贫困的专制”，有更多人生息于小康。但政府与市场二支点社会结构仍远达不到制度稳态，中国还需要民主

政治和法制来为政府分载社会压力，或许还需要能使人向善的道德规范的帮助，来实现多支点的现代社会制度结构安排。

如果未来政府的负担越来越少，那么未来公民的私权就越有保障，但这毕竟是理想目标。在建立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经济体制改革既有的成功经验或能帮助中国在选择优化的手段时获得如下启发：（1）用渐进的改革方式，更容易接近类似革命的结果；（2）选择手段时发掘智慧比一哄而起的气势更重要；（3）改革和发展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监护；（4）改革应由易到难，从共识多而不是分歧多的领域开始；（5）潜心造就一种制度的实质性基础比追求形式更重要；（6）改革的时机和力度应落在中国政治、经济等资源可承受的范围內。

第一章

政府：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责任

一、客观评估中国改革成就

1. 引言

中国大气磅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短期内迅速做大财富蛋糕，大大拓展了人类对经济奇迹概念的认识疆界。它证明，中华民族能够从失误中汲取教训，从挫折中得到锻炼，能以更快速度前进来弥补曾欠缺的发展时间。对此，政府和人民都有一份不容置疑的功劳。中国的成就或者能用历史的偶然性来解释，或者能用新“制度是由‘文化基因’编程的结果”^②来解释。但是，其中的必然性与其说是由于这一代人比其先辈聪明，不如说这一代人对先辈的经验和失误进行了充分反思而更富于智慧和创造力。

在迈过新世纪门槛之际，中国大陆所创造的商品和劳务价值按固定汇率计算已突破 1 万亿美元大关。考虑到真实（市场）汇率和庞大的未进入统计口径的经济渗漏，2003 年中国大陆的 GDP 大约应是这个数的一倍以上。^③

外国人常说中国的发展是个“奇迹”，即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能够全面解释中国迄今为止的巨大进步。理论解释不了的实践只能用“奇迹”一词来概括。

^②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

自下而上的数字“水分”肯定有，但地下经济和瞒产逃税之数亦不在少，二者都有事实支撑。一般说来，乡镇企业倾向于高报产值，而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倾向于低报、瞒报产值。目前在中国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真实的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要多于乡镇企业，而且前者的市场竞争力也大于后者。

所有不怀偏见的人在评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时，至少存在一点共识，即中国人在创造财富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施展：除了生活经验上的证明，没有几个人愿意再去过 30 年前的日子，能最有力地证明“今胜昔”的判断。最重要的是，曾经积贫积弱的多数中国人吃饱了，穿暖了，享受了莫大的实惠。首先取得温饱，人们方能以“饱汉”的状态追求其他目标，包括有时间培育权利意识、拷问宇宙或者享受闲暇甚至消费无聊……

客观评价现实中国，很难在“好得很”和“糟得很”之间作一秒钟内的简单选择。“很好，但是……”的思维方式较为接近真实。所谓“很好”，不但指经济实惠，最可喜的是出现了那些保证改革势头不可逆转的因素，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向着现代文明靠拢，百姓精神生活大为松弛，言论自由水平超过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人们开始享受不放肆的自由，私下“骂娘”的自由几无约束，人们有理由预期更多的个性延展；所谓“但是……”大抵要包括富而不均、腐而不败、同而不和、言而无信、政府管得太多或政府管得太少，还有环境问题等等。

讲清楚中国的成就和问题远不像在仓库里清点存货、计算损耗那样简单。把“成绩讲足，问题讲透”已属典型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渐进改革的关键在于“进”，“渐进”远不像字面所显示的那么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每隔几年，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演奏的政治经济交响乐的主旋律（热点问题），就会随着各种乐器的协同变奏而变化一次。这就要求本书的研讨必须尽力保持在同一逻辑层次，既不能以京城、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表现妄推全国的经济繁荣水平，自欺或难以欺人地谎称到处莺歌燕舞；也不能以农村贫困户、城市贫困家庭和个人权利屡遭侵犯者的不幸经历，来劝诱正直的人掬泪，对现实一骂到底。

2. 评价改革绩效的维度

评价中国改革绩效的维度很多，第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来自自我评价。与 30 年前中国从上到下敢于、善于、长于、精于自吹自擂相比，高纯度的夜郎自大心态已经被中国人扔进了太平洋。在大部分地

方，“人人都说家乡好”的习惯，逐渐被检讨自己的差距和不足所取代，理性进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据此人们有把握判定，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惟此时代为甚。改革开放初期被中国知识界所赞赏的日本国民的忧患意识，目前在中国只多不少。作为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和社会信息中心，政府有比公民更详细的问题清单。

发展中国家的忧患意识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动力。巧于利用，会产生类似知耻而后勇的发展动力；但如果驾驭不好，则会导致危险的社会失序。无论哪一种情况，由此形成的政治经济压力都需要政府来承担，这是由特定社会制度结构决定的。

评价当今中国的第二个维度来自国际间。当中国人在封闭中自封为世界之中心、财富之源泉、制度之典范的时候，外国人总是颇不以为然。^①当中国人致力于富民强国，一尺一寸、一分一厘地计算与发达国家差距时，中国的经济成就获得了国际舆论并不吝啬的好评。

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自1978年以来，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多，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发展”。^②享有国际经济“乌鸦嘴”称号、言词刻薄的著名美国经济学家P. 克鲁格曼，在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也金口难开地赞扬中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其十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的改善”^③。而那些以中国越穷世界就越安全为思维基础的“中国威胁论”，是人类进步过程中产生的新鲜垃圾。

上述两个评价维度都没有理论价值，不过是对事实的简略陈述。然而官民对具体问题的价值判断是否一致，无疑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利玛窦当年画了一幅西方版的世界地图，为了满足当时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的“品味”，他不得不把处于远东位置的中国尽量往中间画。

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页。

转引自易纲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载《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政府对自己的工作给予表扬和自我表扬，基本上符合国际惯例，各国政府都善于自我表扬。问题是弱势群体并不同意政府对自身工作的所有评价。由于缺乏合理辩论机制，各社会阶层对同一问题的判断亦存在不少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分歧。因改革收益差别导致的政治态度十分复杂——人们甚至不能区分哪些差别由市场机制造成，哪些差别由政策失误造成。但是，官民对同一问题判断的关键差异是，公民追求微观层面上的合理性，政府则追求宏观层面上各政策方案的代价之可承受程度。二者侧重点的差别在于目标合理与手段合理。而问题的实质是，由谁来承担一项公共政策的经济代价更合理？该问题当然极具政治敏感性。它始终在考验着政府的智慧。

应当看到，现在中国各级政府承受的政治经济压力不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小，有些值当，有些不值当。不是简单的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等概念能诠释和轻易打发的。

现实中国社会脉动的强定理是，全社会技术结构进步的速度快于制度结构调整的速度。由于公民自主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制度供给不足，因而使得指出、归纳存在的问题太容易，找出、选准低成本解决问题的方案太难。“办法总比问题多”的自信已经很令人怀疑和过时了。这是改革涉及到更多人、更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决定的。

3. 不轻松的归功问题

有了在短期内中国财富多倍翻番之“功”，便有了一个怎样“归功”的问题。这不是小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怎样评价中国官民的智慧和运气、经验和教训以及对未来改革的预期。特别是，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应从相对成功的渐进经济改革过程中汲取哪些经验。其中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尤具关键性。

追求政治安全的“归功”方式，不外乎把一切成就归功于十几亿中国人民。这种政治漫画式的恭维，表扬了每一个人，也等于批评了每一个人——它经不起反证。比如，为什么 20 世纪前 70 年中国人就不能创造经济奇迹？

抽象地把一切成功全部归于人民的思维方式过于大而化之。这种

抽象掉政府作用的评价一向华而不实。真正的问题也许是，在不为政府“护短”的前提下，在政府主导的市场化进程中，人们是否客观地评价了政府的工作？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目前中国的各项事业离开了政府的推动和组织，或者说政治监护，我们依靠什么现成的机制更有效率地填补这种真空？市场一碰到公共问题就失灵，且不说中国的市场制度供给还不充分，不大灵。

由下一代人来评价历史应该更客观一些。我们不妨猜测，下一代中国人将如何评价这一代人的功过？我想，这个答案的主流部分不会少于以下要点。

第一，改革开放 25 年的成就将使中国公民长久地享受一份实惠和自豪。因为在这一代人手里，中国大陆创造了一个大国用最短的时间使经济翻番的世界纪录。作为大国经济，该纪录以最和平的方式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中国未来的任何发展都离不开这 25 年所积累的本钱。这一时期铸就了现代中国相对丰富的物质基础。现在对 GDP 失去了兴趣的人将被证明过早地转移了注意力。

第二，“渐进改革”概念最主要的实践效果在第二个字。“渐进改革”终究是中国的特色和向人类贡献的一份独特的制度演进路线图。“渐进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受控制的改革，控制主体只能是政府权力。这决定了，中国改革路线图对纪律的强调多于对自由的强调，并以物质实惠加以补偿。但相对于计划体制下“不服从者不得食”的约束，向自由经济迈进的任何一小步，都会导致个人选择空间的实质性扩大。

第三，渐进改革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制度保证。总结这一点至少可以讲三重因果关系：(1)渐进改革是距离暴力形式最远的一种制度调整；(2)渐进改革使社会“安全阀”不必在短期内承受难以预测的巨大压力，而代之以在长期内能承受相对较小的压力；(3)渐进改革更能确保中国的贸易路线不依靠炮弹的轨迹引路，外资至少可以期待政府严肃地对待契约和承诺。当中国和平崛起时，中国比谁都更希望和平地发展、和平地改革。中国人想“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横行”。中国说到做到了。

第四，跨世纪的中国大陆，兼有生气勃勃和缺规少矩两大特征。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演练着人类经济史上最盛大的凯旋华章。政府忙得满头大汗，艰难地控制着中国改革的“方向盘、油门和刹车”。同时，要论冒险家的乐园，创造神话的可能，以及巧钻制度空隙发横财且能成功逃税的自由放肆，这也是一个不赖的时空。政府力所能及和明智地以局部次优为代价追求全局最优，为有惊无险地驾驭中国的改革之船提供了可能。

第五，中国在和平时期最有成就也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时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25 年间——旧体制瓦解，新体制幼稚。政府选择以小乱为代价释放大乱的能量，在宏观上不允许中国走错一步棋。而微观略显失控的结果，导致了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得到最充分的展示。这期间，最神奇的创造、最动人的故事、最高尚的人格、最出众的智慧、最肮脏的交易、最卑鄙的计谋、最无耻的行径，素材之丰富，情节之曲折，过程之生动，结果之难料，足以支撑几代文学家对创作素材的需要。

4. 政府的承诺和本书框架

本节的最后一个议题需要人们启动记忆的机器。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政府曾承诺要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 20 世纪末使中国的 GNP 翻两番。这个承诺兑现了吗？当时所有购买了“期货”的人现已获得了大幅升水的市值。参照外国领导人竞选时最有说服力的措词问：“你们的生活比四年前变得更好了吗？”任何讲良心的观察家和不讲良心的实用主义者的结论都一样，即在中国获得一个可靠的简单多数的肯定回答，非常之容易。当然政府还承诺要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官民还需为此奋斗。

本书其后的文字将无法掩盖理性主义倾向。笔者试图至少跨越经济学科来探究中国改革路线图中的那些基本因素和具体机制，并追求用历史感来支撑现实感。本书的第一章具有给定前提、提出问题的综述特征，核心是考察中国社会制度结构的现实状况，评估政府的负荷。本书第二章旨在“让历史告诉未来”，明示中国制度变迁亦具有“历史的囚徒”性质。本书第三章用了过小的篇幅描述了每个中国成

年人都有充分发言权的具体过程，认为该过程可用“各个击破”的战术体现政府所采用改革策略的实用性，解释中国的各类资源条件决定中国一次只能“买到”一部分新体制的“预算约束”。本书第四章具有形而上的特征，力图解释市场“进化”和“催化”两类不同特征，分析政府利用权力催化市场发育的意义和代价——最好结果是同时收获经济高速增长和腐败迅速蔓延，并在其后的第五章着重讨论腐败问题，认为腐败源于公共权力介入市场发育，权力从已发育成熟的市场中撤出将缓解腐败烈度。本书第六章旨在借鉴经济改革经验探讨政治文明进程的约束条件。总之，讨论政府问题和改革策略的重点不在目标理性，而在于手段理性。

二、迅速膨胀的财富蛋糕

1. 丈量财富蛋糕的尺寸

我国公开、及时、精确的统计信息之短缺是非常严重的，原因是我国政务公开的程度有限^①。一般说来，政府工作人员有意掩盖问题的动机总是强于宣传成就的动机。但是，25年来中国政府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把国家带出了财富匮乏、国穷民困而濒临大乱的险境，毕竟是一个事实。先做大财富蛋糕，乃是测度一国政府和公民有多大本事的第一项指标。今天人们关注有再分配的增长是自然和合理的，而30年前人们讨厌没有个人福利增长的再分配，似乎更自然、合理和不言而喻。

首先，中国大陆创造了人均收入翻番的新世界纪录。依据世界银行在1997年公布的数据由图1-1所示。构成人均收入翻番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从1979~1997年间，中国在这方面也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详见图1-2、图1-3、表1-1。按照正常的人类

我曾听不止少数的政府官员以可笑的自鸣得意口吻说“我们这里的第一手资料外面是搞不到的”，这确实是事实。

理智，财富首先要被生产出来，然后再讨论如何更合理地分配它。应该说，在物质财富的产出方面，我们今天得到的，正是我们在 30 年前最想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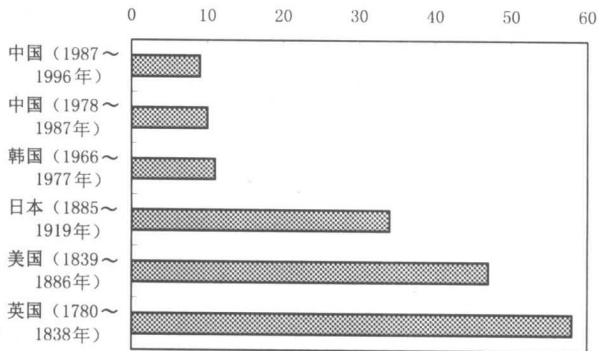


图 1-1 部分国家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年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20 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版，第 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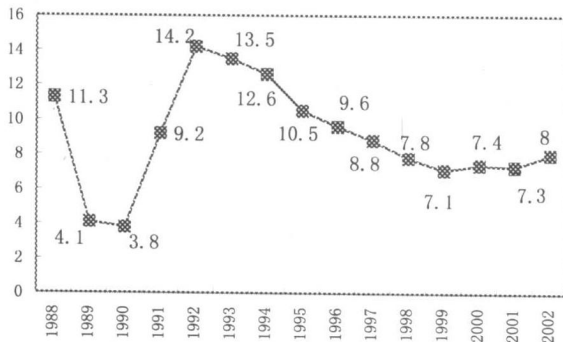


图 1-2 1988~2002 年中国 GDP 增长率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1》第 52 页数据及国家公布的 2001 年、2002 年中国 GDP 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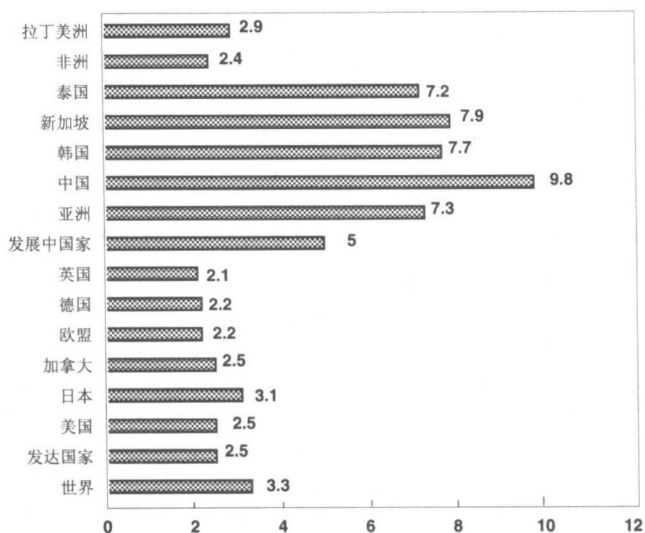


图 1-3 1979~1997 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比较 (%)

注：根据《解放军报》1999 年 6 月 15 日第 5 版有关数据绘制。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 1-1 按汇率法 计算的世界排名前十位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 序号 | 国别 | GDP (亿美元) | 各国 GDP/世界 GDP (%) |
|----|------|-----------|-------------------|
| | 世界总计 | 313369 | |
| 1 | 美国 | 98828 | 31.5 |
| 2 | 日本 | 46771 | 14.9 |
| 3 | 德国 | 18701 | 6.0 |
| 4 | 英国 | 14134 | 4.5 |
| 5 | 法国 | 12863 | 4.1 |
| 6 | 中国 | 10800 | 3.4 |

世界银行按美元计算的各国 GDP 数据采用的是各国最近三年的一种平均汇率，而不是当年汇率，这种平均汇率考虑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汇率变化因素。参见许宪春：《世界银行关于各国人均 GNP 的计算方法》载《经济学消息报》1999 年 12 月 17 日第三版注。

续表 1-1

| 序号 | 国别 | GDP (亿美元) | 各国 GDP/世界 GDP (%) |
|----|-----|-----------|-------------------|
| 7 | 意大利 | 10685 | 3.4 |
| 8 | 加拿大 | 6895 | 2.2 |
| 9 | 巴西 | 5876 | 1.9 |
| 10 | 墨西哥 | 5745 | 1.8 |

资料来源：《国际经济信息》2001年第20期。

转引自许宪春：《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及其国际经济地位展望》，载《经济研究》2002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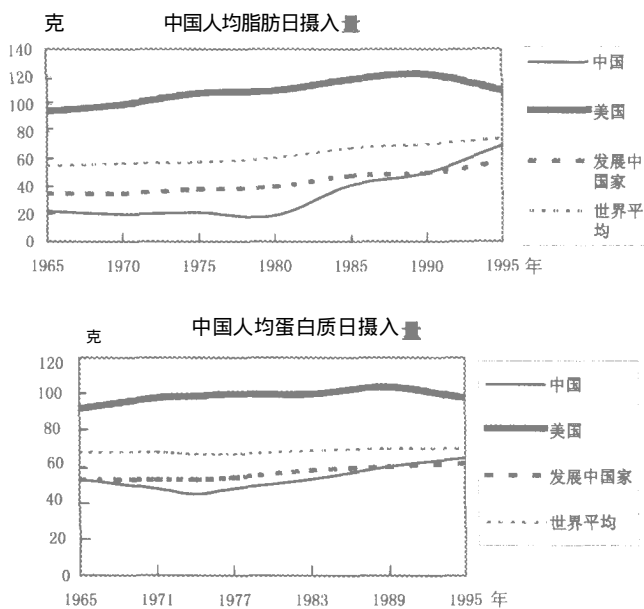


图 1-4 1965~1995 年中国人均蛋白质、脂肪日摄入量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 人均占有财富的典型数据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与国民整体生活水平呈正

比。根据测算，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人均蛋白质和脂肪的日摄入量就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相关数据分别如图 1-4 所示。

中国传统的忧患顺序被概括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根据林毅夫的严谨计算，中国农民在稀缺的土地上生产粮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如果中国农民愿意，粮食产量可稳定在 5 亿吨左右，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拥有量却处在世界 70 位以后。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人“吃”的问题到底解决了没有？

根据曹锦清扎实的调研资料和笔者的调研感知，以下三点结论基本可靠：（1）中国农民普遍能达到历史上同一地区“地主”（超过富农）的饮食水平和质量；（2）富裕的城镇居民的饮食水平不亚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穷者吃饱肚子也不难办到；（3）多数农民还不能享受依靠粮食转化来的肉、蛋、奶。曹锦清以一村为例指出：“如仅从吃的一项来看，如今是贫困的人家，也比解放前的当地大地主家吃得好。如从住房与穿衣盖被方面来看，全村半数以上的农民超过了从前的大地主，只是没有从前地主的那个威风。若向后看问题，中国内地乡村的经济与村民生活达到近一二百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① 作为参照，1820 年中国占世界各国生产总值中的份额高达 30%——当时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② 因此“近一二百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就等于一二千年来的最高生活水平。尽管与发达国家比，这件事并不值得令人陶醉。

另一项研究认为，中国城市人口直接消费的粮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出现了人均消费水平的减少。而在广大农村，人均直接消费的粮食长期保持在 260 公斤左右。^③ 即中国农村平均每人每天拥有约一斤半粮食的消费量。这使得中国在上世界上人均粮食拥有量处在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0~261 页。

世界银行：《2020 年的中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 页。但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史专家程念祺、樊卫国等人均对此数据的真实性持强烈怀疑观点，认为该数据至少举证不力。据悉，这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中国价格学会课题组：《“九五”期间农产品价格政策研究》，载《经济研究》，1996 年第 8 期。

70 位以后的数字显得没有多大意义。外国人喊着、闹着非要把更便宜的粮食卖到中国来倒是真正的烦心事。

中国的发展非常忌讳追求一夜间梦想成真的乌托邦式激进跳跃。人们不怀疑中国尚有 5000 万、8000 万或 1 亿人口未脱贫的数字，然而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证明和保持了近代以来中国最长期社会安定的基础更在于：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平均每分钟有约 20 人脱离了贫困的生死线。中国的经济奇迹正出自这种“积跬步以致千里”的过程。如果人们了解 1978 年时的“三农”问题有多么玄，就能理解其后中国农业取得的成就有多么神。

在 1978 年，8 亿农民只生产 6095 亿斤粮食（约 3 亿吨），4224 万担棉花。当年农民（社员）实际分配的实物和现金共为 582.36 亿元，人均从集体分到的收入为 72.5 元。加上其他各种收入，总共为 133.57 元，平均每天为 0.365 元。当年全国城乡存款 215 亿元，农村社员储蓄 55.7 亿元，人均 6.93 元。^①从理论上说，用这些钱来买粮食，只够再吃三个月，也许只能活 6 个月（假定没有新收获和外援）。1978 年，全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人均 21.9 元，^②相当于 100 斤大米。这种局面大约不能由“问题”二字概括，而应取“危机”二字描述。饥饿的农民擅长“揭竿而起”。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不是挨不挨骂的问题，而是还能否控制大局的问题。当时的“三农”问题涉及农民的生存，核心是经济问题。如今政府面临的“三农”之累则属权利意识觉醒后的政治问题。此“三农”非彼“三农”。现在的政府是“累”，当时的政府是“玄”，是合法性危机。

3. 政府的合法性与渐进改革策略

让我们先欣赏一段描绘得十分传神的文字，然后再转入较严肃的讨论。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5 页。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中国金融统计（1952～1991 年）》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 页。

穿越一条 30 年的长长时光隧道，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光脚丫穿着麻绳纳底的布鞋，“啪嗒啪嗒”向我们走来。这男孩一年四季穿一身灰布外衣。冬天絮上棉花是棉袄，夏天去掉棉花是外套。即使是这身衣裳，也是他的哥哥姐姐逐次传给他的。不光是钱不够用，布票、棉花票也吃紧啊！

穿衣还在其次，吃饭更是当紧。俗话讲：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粮食在那个年代是严格定量的。成年人每月细粮粗粮供应 28 斤，孩子就惨了。一般家庭，如果有四五个孩子，全家工资相当一块就给“高价粮”支出了。饥饿像个甩也甩不掉的影子，一直相伴着这个小男孩的童年。

但这丝毫不影响小男孩的快乐。他有快乐的理由。从他懂事起，有一种憧憬就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他的脑海——共产主义就在不远的未来。而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几个小伙伴在一起憧憬：

到了共产主义你想要什么？

一个说：要一双皮鞋、一双凉鞋、一双球鞋、一双布鞋。

另一个说：每天可以吃一顿红烧肉。

今天，回到 30 年后长长隧道的这头，那个小男孩和他的小伙伴都已人到中年，只留给我们在市场经济严风酷雨中拼杀的一个背影。

虽然，还远没到小男孩他们当年憧憬的共产主义，但他们当年的愿望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已经实现了。

今天，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比 1970 年增加了 10 岁。^② 恐怕谁都不否定延长生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目标。评价中国政府 25 年来的工作，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得分因素。

最后，如果人们把完全由市场调节的汇率视为一面镜子，那么，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就是一面哈哈镜——太不真实。购物经

杜浦涛：2002 年 9 月 16 日《中国青年报》。

世界银行：《2020 年的中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 页。